

Column

■ 说言晓论

大灾之年 中国经济仍将繁荣

◎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2008这个戊子年，是多灾之年。十天前的四川大地震让全国沉浸在一片凝重、哀伤的气氛之中。在空前大灾难的影响下，当前的经济形势变化究竟如何呢？笔者上次在本栏曾经谈到，去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走势充满着不确定性。这种情形与1997年、1998年时候的情景有惊人的相似性。第一个相似性，就是两者都面临着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但总体趋势则是不断恶化，并且其恶化程度可能远远超出事先想象。第二个相似性，就是两者都面临着某些重要的经济临界点的变化，因而经济运行事实上是走在一个十字路口。第三个相似性，就是物价的压力仍然在指数上彰显，致使政策导向很容易出现迷惑，难以灵活调整。

因此之故，温家宝总理已经坦言，2008是最困难的一年，难就难在不可测因素性，不确定性强。现在，一季度已经过去，经济的面纱在逐渐揭开，相对来说不确定性已经降低。

比如说，外贸趋势已经清晰，从一季度情况来看，出口折年率增长率大幅下滑50%；这使得今年的出口会对经济增长有一个多点的负面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数据显示，内需非常强烈，名义投资和消费都处在高峰，甚至于顺差的减少也是因为内需强劲进口太多所致，国际物价的大幅攀升也与中国内需强劲导致进口过猛有关。此外，政府已经警惕经济下滑风险，温家宝总理明确谈到既要关注通胀风险，又要关注经济波动风险，还要关注国际经济风险，为此，宏观调控政策要有灵活性，要注意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风险的把握。这表明政府的调控在走向成熟，政府的调控意向正在全面。此外，面对股市的一蹶不振，政府最终克服各方意见阻挠，及时出手，“财产性收入”增长崩溃所导致的负

尽管有灾难的影响，而且今年的经济会在外需下滑下靠内需继续支撑，但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不会低于10%，而物价升幅可能会在6.5%上下。中国经济不仅已经告别通货紧缩时期，也已经告别高速增长、低通胀时期。中国的资产价格特别是房价会因整体物价的上扬而出现上涨的压力。

财富效应”的风险也在缩小。

综合今年以来经济基本面和政策调控面的信息，我们已经大体可以知道，尽管有灾难的影响，并且今年的经济会在外需下滑下靠内需继续支撑，但增长速度仍然不会低于10%，而物价升幅可能会在6.5%上下。这样一个经济运行状态对房地产的支撑将是强劲的，支撑点有二，一是经济仍然维持高速增长下的房地产实质有效需求也将保持高速增长。二是物价高速增长时期，对房价会有一个强烈的支撑。

谈到物价高增长，笔者认定，可以说中国经济不仅已经告别通货紧缩时期，也已经告别所谓高速增长、低通胀时期。目前的形势是，政府采用能够使用的各种办法不让物价上扬并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比如，粮食连续四年丰收，国内粮食库存尚丰，政府不遗余力地控制粮价，所以目前中国粮价远较国际水平增幅为低（猪肉也如此）。而在能源方面，2003年以来国际能源价格平均每年的增幅是29%，但中国平均只有9%，也远较国际市场为低。但是，中国物价能否持续拒绝与国际接轨呢，这是值得怀疑的。另外，国企使用的土地是不交地租的，使用的资源是不交资



源税的，所有企业的信贷资金成本也不如市场成本高，环保成本也没有到位。假如这些成本的因素正常释放，按花旗银行沈明高博士的保守估算，2007年最低在3.8万亿左右。所以，可以说，无论是按目前的国际市场涨价压力，还是按未来中国成本正常化的压力，中国都将进入一个持续的物价高速增长时期。

事实上，中国过去30年的物价平均年增长高达6.5%，因此一个5%的物价年升幅其实是正常的。过去几年的低物价乃至物价的负增长反而是不同寻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资产价格特别是房价也会因整体物价的上扬而出现上涨的压力。在央视《对话》栏目的“该不该买房”节目录制现场，我曾追问两位认为房价会大幅下跌，其中北京房价可能大幅下跌50%的朋友，有没有哪个国家的房价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大幅下跌甚至下跌50%的例子？结果两位全都哑然无语。

除了上面列出的种种因素外，当前流动性过剩及信贷的情况仍值得所有关心资产价格变化的人关注：一是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有增无减，一季度外汇流入1500亿美元以上，央行不得不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来对冲。而粗略估计，在流入的外汇中，大概有800多亿美元是难以解释的部分，其中大部分应该是热钱。由于国际资本仍将中国作为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安全岛”，中国市场上的资金仍然会相当过剩。考虑到目前居民存款接近20万亿，其中40%是活期存款，而今年以来新增存款在3万亿以上，相比之下，去年全国的住房销售额也就2.7万亿。很显然，仅从资金的角度看，由潜在的资金支持的房市需求的压力是相当大的。

■ 知无不言

私人财富积累越多， 公共责任就越大

——理性个体在灾难突降时的最大理性

◎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当灾难，特别是不可抗力性的重大自然灾害突降时，我们会越发强烈意识到人类本是个互助的整体。此时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高度一致，甚至私人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公共利益而得以保存。因为当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遇重大变故时，很难再有你我他之分。此时，只有作为一个互助整体，才可能增强自身和他人的抗灾救灾能力。这是理性个体的最大理性所在。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哪个国家在发生重大灾难事故时，只要是为了救灾救难，法律都许可公共机构拥有无条件征用私人财产的权利。

虽然当今市场经济社会利益高度分散，但同时，即使在正常平安的年里，个体私人利益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保存他人利益与增进作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性，也都是从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无法相比的。正因为市场交换不断延展和深化的过程中，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越来越细致，任何个体离开了市场交换都无法生存，更别说发展了。理性的个体若要增进一己私利，就必须为更多的人提供有价值的商品与服务。越是以低成本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同等质量或更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人，其私人利益也就越多，也就越富有。所以那些当红影视明星或畅销书作者，就比那些学院派艺术家、小众作家、学者，在物质收入上要高得多。无论后者怎么强调创作的严肃性和思想性，都无法改变这一结果。

但这也恰恰说明，在当今世界，那些最富有者必定是更加仰仗和依赖最广泛社会公众的人。除非这些巨额财富通过特权寻租而来，那另当别论。仅就合法、合理的正常情况讲，如果说“贡献”，在市场等价交换的环境里，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同公众购买者是一样的，是相互的“贡献”。巨额财富积累者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时，固然包含着勤奋和努力，但只有最广泛公众的认可、接受和持续性购买，才会促使其产品生产与经营规模的扩大，才更加激励服务提供者的热情，增加其进一步提高收入的机会，也才能够确认其较好的市场和社会地位。所以，私人财富积累越多，公共责任越大。当特别重大灾难发生时，危及公众人数越多，造成的破坏与损失程度越大，那些巨富者越是有责任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伸出援助之手。

巨富者的这一举动并非是为了不得的“慈善”之举，而是理所应当的，是履行其应有公共责任！巨富者的捐助行为并非纯粹为了他人利益，也是为了其私人利益，因为他的巨额利益是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的，离开了公众的公共利益，就没有任何财富积累源泉。而且，富有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富有的人总是相对那些不富有的人而言的，离开了那些相对不富有甚至穷人，就谈不上什么富人，更不用说巨富。

由此，那些在灾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行动，捐钱捐物，并主动

保持自我沉默的低调富有者，最值得肯定。那些以为捐钱就高尚得不得了，并趁机在媒体大做广告者，最是虚伪，最易遭人诟病，甚至不排除“发灾难财”的意识在作怪。这种意识和行为，与那些没有在第一时间行动，或者相比其收入和财富积累，只是象征性地捐出一小笔钱的巨富者一样，其恶劣影响与伤人程度甚至比自然灾害都要来得大，是现代文明社会所最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些国家在发生重大灾难事故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冒着生命危险救灾的人，你的钱财又算什么呢？何况那些急需救助的受灾者过去和将来都是你财富积累的贡献者。他们更不明白的是，金钱本身并没有力量，只有人才是力量的源泉。即便是从做生意的角度讲，他们也许忘记了最通俗的一个道理：有人气才有财气！不会持续聚拢人气的人，是不可能持久把握住财富的！

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是，中国是从行政垄断一切财富和资源的高度计划经济逐步转轨过来的经济体，原本大家都是没有财产积累，都几乎一样的贫穷。三十年转轨的结果，今天的中国已有不小的贫富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在大幅度快速扩大。但需要追问的是，那些今天已遥遥领先的巨富——无论是那些以私营、民营或股份制等方式拥有或经营企业的人，还是那些从事服务业的明星，尤其是前者，企业的建立与经营，巨额的财富积累，不都是由原来政府垄断资源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基础的吗？不都是因为获得了更多公共政策支持的结果吗？特别那些诸如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性资源以及类似金融业等政府严格特许经营的行业，没有来自本质上属于全民的财富与政策的支持，本领再大，才能再出众，也是无法建立起企业并不断壮大的。

想一想，以如此基础，通过如此方式崛起巨额财富的少数人，当国家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时，有什么理由不在第一时间行动，回报社会公众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阐述过财富积累的“邻居效应”，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的抗灾救灾中，那些未直接受灾人们的反应与救助行为，尤其是钱财捐助，更是有着“邻居效应”。贫穷者的一元捐助，其社会价值也许远远高于巨富者的几百万元。

天下从来就不存在只有利益没有责任的事情，自然灾害也不会对富有者网开一面！谁都该清楚，无论已经拥有多少财富，当你哪一天也处于重大自然灾害的围困之中而急需救助时，那些都是苍白而无力的；谁都不应该忘记，财富越多，你的私人利益就越依赖于公共利益，你的公共责任也就越突出越重大，就越离不开普通公众组成的社会。

■ 内外

同一理由， 研判何以冰炭不容

——“我看人民币汇改”之二

◎ 张明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博士

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升值，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广泛争议，原因在于汇率政策是个“非中性”政策，对于各利益集团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任何一种非普惠式的制度的实施都必然会引发受损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然而，汇率政策虽然对不同行业产生着不同影响，但并非一种单纯的产业政策，它同时也是一种宏观经济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必须通盘考虑汇率变动对国民经济方方面面造成的影响，详细计算汇率变动的成本与收益，在权衡利弊后作出审慎决策。

从1994年人民币汇率变轨到2005年汇改的12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几乎一直保持在1比8的水平上。在这12年间，中美经济基本面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几乎所有舆论都认为，人民币的名义汇率水平远低于均衡汇率水平，即人民币汇率被显著低估。但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大幅升值从而向均衡汇率复归，在国内外均存在激烈争议。

反对升值者们并不讳言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低估，然而他们认为这是近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民币名义汇率显著低于均衡汇率，意味着中国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场上拥有显著的价格竞争力，使得中国制造能风靡全球。一方面，净出口的增长、与出口行业相关的投资，成为中国经济近十余年来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出口行业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出口行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内地到沿海的迁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因此，反对者们担心，在中国出口行业产业结构并未明显提升、产品附加值依然较低的情况下，一旦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将造成中国出口商品的外国价格的显著上升，从而极大地削弱中国出口商品相对于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同类商品的竞争力，造成中国贸易顺差下降。人民币对中国出口行业的负面冲击，一方面将会削弱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可能导致大量劳动力失业，危及社会稳定。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约10%，2008年第1季度中国出口总额按人民币实际价值计算的增长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5个百分点，部分地印证了这一忧虑。

反对者们另一大理由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将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迅速缩水。目前中国已是全球持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外汇储备存量超过1.65万亿美元，其中70%左右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则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外外汇储备的存量价值损失约为23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7%。如此巨大的价值缩水自然令人心痛。

针对反对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两条理由，人民币升值支持者们的反驳针锋相对。其一，难道中国出口越多，对中国带来的好处就越大吗？人民币汇率低估，意味着中国出口商品价格被压低，中国进口商品价格被抬高，即中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以4亿条裤子换回一架飞机，这样的廉价出口战略真的能够提高中国人的福利水平吗？况且，廉价中国商品的全球风靡，是以中国非熟练劳动力十年不变的血汗工资、对资源的严重消耗、对环境的大肆破坏为代价的，这样的模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必须尽快改变。在人民币持续低估的背景下，中国出口企业仅靠价格优势就能生存，它们没有动力去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而仅仅满足于靠彼此之间血腥的价格战来取胜。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出口行业难免会痛苦调整，而这恰好提供了兼并收购以及资产重组和升级的契机。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成为改善中国贸易条件和国际收支失衡、促进中国出口行业升级换代的必由之路。

其二，人民币汇率升值固然会造成外汇储备国际购买力的损失。然而如果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低估，将会带来更多的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加剧外汇储备的累积，并可能造成更惊人的最终损失。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缓解通过贸易和资本渠道的资金流入，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量甚至存量，最终有助于降低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

其实，人民币升值最重要的，同时也最容易被人忽视的收益，是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内产业失衡。人民币汇率从本质上而言，是中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中国非贸易品价格长期低于贸易品价格，从而导致更多的资源从非贸易品部门（服务业）流向贸易品部门（制造业），导致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严重滞后于贸易品部门。由于非贸易品是完全由中国居民消费的，而相当一部分贸易品是由外国居民消费的，因此，非贸易品部门发展不足而贸易品部门发展过度，是中国内需不足而出口过度的根本原因。因此，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将会提高中国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导致资源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服务业的繁荣不但会提高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也有助于吸纳更多的就业（因为服务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远高于制造业）。换句话说，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助于缓解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失衡，从而最终也有助于缓解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外贸顺差的下降）。

最后，人民币升值还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回顾世界历史，没有哪一个经济强国是靠长期压低汇率水平而发展壮大的，相反，它往往是通过开放本国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维持一种较强的本币汇率以推动本国货币成长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来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既然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那么在次贷危机造成美元贬值的前提下，升值将会有助于人民币加速成长为国际性货币。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审慎地开放资本市场，例如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和外资企业到中国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和债券，在香港地区设立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等，则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将大大提高。人民币成为东亚货币一体化过程中的锚货币，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

■ 浮世微言

津巴布韦的货币悲剧

◎ 杨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无论在纸币还是金融货币时代，通胀都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早在古罗马时期，暴君尼禄首次用同量金属铸成更多货币，造成的货币贬值加快了罗马的衰落。而在16世纪，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从美洲和非洲掠夺的黄金和白银大量流入，欧洲国家遭受了一轮广泛而持久的通胀冲击。

当然，现在我们常说的通货膨胀一词，虽然事实上早已存在，但却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才被创造出来的。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为筹集战争经费，大量发行一种不能兑现的绿背纸币，使物价如空气人袋一样膨胀起来，因而被人形象地用Inflation来表示。

谈到历史上著名的恶性通胀，一战后的德国和二战后的中国都是典型例子。与恶性通胀相伴的是巨额面值的钞票，如1946年的匈牙利出现过面值为10的27次方货币单位的钞票，1993年前南联盟发行过面值5000亿货币单位的纸币。

随着各国市场机制的完善，以及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提高，恶性通胀渐渐只存在于世人的记忆中了，但如今非洲的津巴布韦又带来了新的通胀警示。发端于2001年的津国通胀，现已达到令人震惊的100500%，货币面值已低于纸的价值。津国政府5月15日又发行了面值5亿的钞票，虽然官方汇率是1美元约合3万津元，但据报道，黑市上的汇率已达1美元约合2.5亿津元。

上世纪80年代，津国与南非都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曾被称为“非洲篮子”，其时津元与美元的比值一度为1比1。1980年津国独立，穆加贝总统执掌大权后，始终面临土地被少数白人占有的历史遗留矛盾。独

立之初的土改政策，是由原宗主国英国提供资金给津国政府，从白人手里买土地，然后分给黑人。但在1989年英国以该项资金运用缺乏透明度为由而停止提供后，津国土改便走向了极端。1996年，穆加贝宣布将在5年内强行征收白人土地，并在2000年全面展开强硬的土改，最终种族矛盾激化，大量资本外逃，英美等国又进行制裁并停止援助，津国经济自此一步步陷入了困境。

土地矛盾是许多非洲国家都有的，穆加贝当初虽然试图维护黑人利益，但过激的行为，却最终损害了长远利益。在面临同样问题的南非，曼德拉1994年上台后也提出土改，但走了一条温和道路，虽然进展缓慢，但却避免了新的经济社会动荡。对解决土地、种族等历史问题来说，这也是一种次优的无奈选择。

黑人获得了从白人手里强征来的土地后，却由于缺乏农业技术、工具和种子，农业生产效率大幅降低，加上天灾，致使农产品连年歉收，粮食供给严重不足，价格于是飞涨，形成了这轮恶性通货膨胀的源头。内部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出了麻烦，外部封锁使又使得外来援助和投资迅速减少，进而使燃油和电力等能源要素供给匮乏，最终使津国陷入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双重泥潭。

在此背景下，穆加贝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失误，使津国经济更加积重难返。一，通过大量印钞票来弥补政府巨额财政赤字。二，实行价格管制政策。2007年，他签署法律成立了一个收入和定价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唯一的定价权，所有违背所定价格的人都将被判“入狱5年”。这些有悖于经济、金融规律的政策，不仅无法控制物价上涨，而且加剧了通胀预期，使津国在“滞涨”困境中愈陷愈深，失业率高达80%，经济也连年负增长。

的穆加贝，是学位最多的非洲领导人之一，应该说对基本经济理论并不陌生。但是，自土改以来，穆加贝就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多印钞票的唯一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通过获得“铸币税”来维持政权运作。

若要总结当下津国货币悲剧的源头，从内部来看，大概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没有采取渐进式土地改革，使其失去了回旋余地，也失去了白人与外部的经济支撑；其次，穆加贝的绝对权威，使其多年没有政治对手，导致政策制定容易走向极端。再者，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的政策，必然会使一国尝苦果。

最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当年列宁就警告过，革命者在夺取政权后，容易陷入腐败的诱惑。姑且不论1989年英国指责穆加贝政府运用资金透明度低是否确切属实，只看当前津国的情况，一方面农村地区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城市里却有英国化城市特征明显的宽敞街道与气派楼房，名牌专卖店与大型商业城罗列在步行街；一方面，恶性通胀使普通人的生活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少数权贵却占有大量土地、房产和汽车……考虑到通货膨胀的本质之一就是具有财富再分配功能，不得不使人怀疑，起码一部分人并不担心甚至纵容恶性通胀，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得利益。

应该说，西方国家的制裁，也对津国恶性通胀负有很大责任。对于土地问题带来的纠纷，英国等老牌殖民国作为始作俑者，显然并没有真正考虑津国人民的利益，而是趁机以制裁来甩开包袱。另外，虽然津国是IMF的成员，但IMF和世行并未对其伸出援手，国际组织的内在职责再次被政治目的所掩盖。

在通胀中受损最大的永远是中下层公众，而决策者的失误会给国家带来灾难，这是津国货币悲剧的深刻教训。

曾获伦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